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翻译学教程

*TRANSLATION STUDIES:
AN ADVANCED TEXTBOOK*

户思社/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翻译学教程

*TRANSLATION STUDIES:
AN ADVANCED TEXTBOOK*

户思社/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学教程 / 户思社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6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

ISBN 978-7-303-12493-0

I. ①翻… II. ①户… III. 翻译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6472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FAN YI XUE JIAO CHENG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70 mm × 230 mm

印张: 28

字数: 488 千字

版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策划编辑: 马佩林

责任编辑: 杨帆

美术编辑: 毛佳

装帧设计: 毛佳

责任校对: 李茵

责任印制: 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总 序

方汉文

进入 21 世纪，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院校科研与教学之中枢，特别是新型的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教材系列的编撰更是学科建设之基石。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教材系列》即是当代本学科建设的一项代表性工程，也是中国高等院校教材进入国际化实践过程的成果。

西方学术中“学科”(discipline)一词的本义之一是“界限”，学科的基本意义就是对研究对象作出界限的规定，划分特定的研究范围。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一书中，把理论科学分为物理学、数学和第一哲学（也称为神学）；应用科学则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两大类；艺术是独立的学科。

中国学术的学科与教材更是渊源有自。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生学习“六艺”的过程中，删定的“六经”（《诗》《书》《易》《礼》《乐》《春秋》），其实就是最早的教材，这一点从《论语》中孔子多次说到的“学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的学科正式划分是在汉唐时期，特别是唐代之后，科举制度与传统教育都使古代学术与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当然，学科的教材也基本确定，“四书五经”等成为学科的主要教材。

比较文学学科自 20 世纪进入中国以来，教材建设一直极受重视。新千年来临后，中国学者提出建构中国特色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理念。这一观念鲜明地反映在教材创新进程中，打破了传统的模仿国外教材的局面。各个研究方向的多种教材纷纷推出，呈现出多元化的教材布局，为本教材系列的诞生提供了条件。

本教材系列是一套面向全国高等院校学科建设与教学实践的规范性教材，其内容、结构与目标定为：

一、理论创新性：对本学科教学的基本内容与中国学者所提出的新理论体系予以全面反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当代中国高等院校的科研与教学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沃土，从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二、汇融当代国际学术与教学研究的新观念，编撰普及型与专著型相结合、具有国际理论视域的教材，特别是对 21 世纪以来本学科的国际新进展深入研究，扩展研究范围，以此推进中国高等院校教材的国际化，这是本教材系列的目标之一。

三、本教材系列是在全国多所重点大学与地方院校教学第一线的优秀教师，特别是近年来留学归国的学者们的鼎力合作下形成的。他们具有丰富的教学科研与教材编撰的经验。撰写者承担了国家与教育部的多项科研课题，成果屡次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被列入教育部研究生教学用书，他们中很多人也是各级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的主持者。

本教材系列的目标在于以革故鼎新、披沙砾金的精神，为教学与科研提供规范性的、最受广大师生欢迎的精品课程与优秀课程教材。

学科建设乃学术研究之千秋功业、高等教育之津梁；教材系列堪称学科之中坚、教学之基石。愿 21 世纪中国高等院校学科教材在国际化的进程中得以流被海内外，偕同广大师生与读者与时俱进。

序 言

翻译是促进各民族沟通交流的重要手段。人类社会若无翻译的存在，其对人类文明进步的影响将是难以想象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仅停留在较低的层次，认为翻译是一项简单的语言转换活动，其中并无理论可言，无须研究。这种认识，导致学界把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建设的努力长期滞后。甚至于在几年前，学者们对翻译学这个提法还如履薄冰，争论不休。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翻译研究自身在理论体系建设方面的不断进展，这个问题在今天看来已经从“有没有翻译学”变成了“什么是翻译学”。也就是说，翻译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应该研究什么。

对于这个问题，学界的表述虽各相异，但总的认识已趋一致。也即：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规律和艺术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外翻译的历史、理论和流派，探讨翻译的性质、作用、标准、原则和方法，描述实际的翻译过程，说明各类翻译的特点和不同要求，探索语言转换的科学性和艺术性，确定翻译人员应具备的素养和才能以及培养途径，预测翻译事业的发展方向等。过去十多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从不同角度对翻译学研究范畴内的具体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当下各地书店里汗牛充栋的翻译研究著作可资证明。但是，在肯定近年来翻译研究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研究的重点和方向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仍然阻碍着翻译学学科体系的健全发展。比较突出的问题是：（1）过分注重对传统命题的研究，对翻译研究的新趋势关注不够；（2）过分关注外国的研究，独立开展本国研究的成果不足；（3）过分注重描写性翻译理论的研究，对应用性翻译理论研究重视不够；（4）过分偏向从文艺学的角度研究文学翻译，对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中西文学相

互影响的研究做得不够；(5) 过分偏向纯理论的研究，对翻译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不足。鉴于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从跨学科的角度对翻译学学科框架体系内的主要内容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使我国的翻译学研究在学术研究全球化时代吐故纳新、与时俱进。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第一个初衷。

从国内近年来出版的翻译研究著作看，多为专题研究。这些研究或以翻译理论为专题，或以翻译史为专题，或以译者研究为专题，各重一面，亮点纷呈。但是，如何打破翻译研究的国家和学科界限，通过对中西翻译研究成果的对比、整理和借鉴，吸收相关学科（如文化学、传播学、译介学、社会学等）的研究成果，撰著跨语界、跨学科意义上的翻译学专著，一直是翻译界应解而未解的一个难题。在已经出版的数部以“翻译学”命名的著作中，可以看到这些学者为之做出的努力。正是他们的努力，为“翻译学”这门古老而又新兴的学科勾画出了浅淡的轮廓。当然，翻译学要成为哲学、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等这样学科体系丰满的显学，还需要关心这一学科发展的学界同仁继续努力，迎头赶上。这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第二个初衷。

考虑到本书内容较多，我们将全书按照研究重点分成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各章所论，主要包括：(1) 西方翻译研究（杨晓华著）。对西方传统和现代翻译理论进行纵向考察，探究和梳理其主要发展脉络和流派，客观解读代表性人物的翻译理论，批评其局限性观点和论断，勾勒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轨迹，跟踪其翻译研究的方向。(2) 中国翻译研究（李林波著）。在与西方翻译理论对比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译论进行了客观的述评，同时对现代译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分类和思考，就中国翻译研究的方向提出建议。(3)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王瑞著）。重点研究了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接受和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具体内容涉及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翻译文学在中国的开端、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现当代翻译文学研究等。(4)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党争胜著）。对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翻译、接受和传播进行了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对其在接受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客观述评和审视，同时探讨了接受环境对文学译介和作品传播的影响，就今后中国文学向外译介工作，从原著选择、译者遴选、组织规划等方面提出了建

议。(5) 双语语料库视角下的翻译研究(黄立波著)。探讨了语料库翻译学的方法论、研究范围、研究对象以及近年来的发展和未来的趋势。具体内容包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范式, 双语语料库的开发与研制, 基于双语语料库的方法论研究、实证研究、应用研究等。(6)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李本现著)。重点研究了在全球多元文化视域下翻译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视角等方面的转型问题。从文化层面对文本中文化意象的传递、文化误读、文化传通等一些翻译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和思考。(7) 全球化视角下的网络翻译研究(贺莺著)。从译者地位、翻译方式及程序、翻译产业、翻译教育的发展变化等角度探讨了全球化对翻译的影响, 同时分析了翻译在全球化语境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阐释了网络文学翻译、创作型翻译、超级畅销书等翻译现象背后的本质。(8) 教育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李瑞林著)。以服务教学实践为导向, 以建立有效的科技翻译、商务翻译、法律翻译、会议口译等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模式为目标, 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 提出了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总而言之, 本书所涉及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当今国内外翻译研究的主要成果, 对于“什么是翻译学”这一具有挑战意义的问题, 从多个维度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但愿此书的出版, 能够对正在走向科学的翻译学学科建设有所裨益。

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 本书之所以能够按期付梓, 一方面要感谢参与撰写的杨晓华、李林波、王瑞、党争胜、黄立波、李本现、贺莺和李瑞林八位同志的辛勤工作, 感谢西安外国语大学聂军、张升余、魏在江、姜亚军、孙敦夫、孟长勇、杨鹏鹏教授对本书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特别感谢梁家林老师对本书的精心修改; 另一方面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马佩林编辑的大力支持。值此拙作出版之际, 我谨在此对他们的付出表示深深的敬意。由于认识和水平所限, 书中所论, 难免偏颇甚至错误, 衷心期望各位读者不吝批评, 慷慨赐教。

户思社

2010年11月20日

目 录

第一章 西方翻译研究	1
第一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渊源与演进	1
第二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	16
第三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学视角	50
第四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	71
第二章 中国翻译研究	84
第一节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及其现代转型	84
第二节 中国翻译研究与西方翻译研究	96
第三节 中国现代翻译研究模式	104
第四节 中国翻译学的建设	123
第三章 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134
第一节 中国翻译文学的开端	134
第二节 近代翻译文学的发展	143
第三节 现当代翻译文学的发展	156
第四节 莎士比亚在中国的译介	167
第四章 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	189
第一节 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	189
第二节 中国古典小说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	208
第三节 中国古典戏剧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	224
第四节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国外的译介	241

第五章 双语语料库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258
第一节 语料库翻译研究范式的建立	258
第二节 语料库翻译研究概述	271
第三节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共性研究	280
第四节 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文体学研究	291
第六章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299
第一节 跨文化交际与翻译	299
第二节 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译者	307
第三节 跨文化交际翻译的原则与策略	312
第四节 跨文化交际翻译中的文化负迁移	323
第七章 全球化视角下的网络翻译研究	331
第一节 互联网与翻译	331
第二节 网络时代的翻译文学	354
第三节 网络翻译与社会文化生活	359
第四节 网络翻译的批判性反思	368
第八章 教育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374
第一节 翻译教学观	374
第二节 译介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向	382
第三节 项目翻译学习模式	393
参考文献	400

第一章 西方翻译研究

西方的翻译研究，与其翻译活动相得益彰，源远流长，繁华昌盛，学说纷呈。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灿若星河的翻译思想家，其翻译思想是人类人文学科智慧的结晶。回顾反思，系统总结归纳和研究西方古今的翻译活动、翻译现象、译家、译事和译论，成为当今翻译理论研究者的使命。“译史的研究，不仅是译事的简单罗列与介绍，更应充分展示翻译的主体因素在翻译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对翻译活动的理论思考，即译家、译事与思考。”^①因而凸显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作用，对翻译、翻译家为人类历史发展所作的贡献给予应有的评价和客观的定位，是本章研究的重点。

第一节 西方翻译研究的渊源与演进

.....

一、西方翻译理论的渊源

刘宓庆先生指出：“要理解和认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不仅要有横向的类型（学）分析，即共时的流派分析；还需要有纵向的系谱（学）（Genetic 或 Pedigree）分析，亦即历时的渊源分析。”^② 刘先生认为，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有三个源头：古典主义（Classicism）、现代主义（Modernism 或 Modernity）和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大体上与“后结构主义” Postructuralism 并行）。古典主义泛指古希腊文化的蔚兴期。西方翻译理论的古典主义时期始于罗马翻译家及评论家西塞罗，终于 19 世纪中叶。译论中的古典主义一般指对古希腊、古罗马文史哲经典的景仰、服膺与效仿。“古典主义”的另一含义是指 20 世纪以前的西方译论，包括古罗马安德鲁尼库斯、西塞罗、贺拉斯、昆体利安等人的古代译论，文艺复兴时期德国马丁·路德、法国多莱、英国荷兰德和查普曼的译论以及 18、19 世纪的近代译论（包括德国施莱尔马赫、歌德、洪堡特，英国德莱顿、泰特勒和阿诺德等人的译论）。

① 许钧、袁筱一：《当代法国翻译理论》，343 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②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32 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现代主义发轫于 19 世纪 40 年代,其间一大批文人墨客、理论阐发者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哲学层面,欧美涌现出一批颇有影响的思想家,以维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和雅克布森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以皮尔士等为代表的现代符号学,以及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和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西方当代翻译理论,尤其是语言学派的翻译思想大抵源自其中,“这是理解当代西方译论绝对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结构”^①。

后现代主义肇始于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西方史学家在广泛分析后现代历史观的基础上总结出后现代的“五反”论: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反目的论(Anti-teleology)、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ist)、反反映论(Anti-representationist)以及反现实主义意义论(Anti-realist-implications)。为了更深入地探索西方当代翻译理论,我们关注的是后现代关于“意义”的观点。后现代场景展现的意义是已死的符号和冻结了的形式,它们不断变幻出一些新的组合,亦即“德里达的观点:不是‘彻底否定意义’,而是热衷于‘消解旧的意义’”^②。后现代主义的这种思维模式和话语体系必然要消解具有相对确定性、稳定性的概念,如译学中的“意义”、“对应”、“可译性”、“主体性”和“文本”,等等。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西方当代译论中出现了非主体化、去主体化、改造主体、非中心化、去中心化等观点,在尼采翻译征服论和本雅明翻译超越论之后产生了巴斯奈特的文化翻译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翻译观、尼兰贾娜的翻译政治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的女权主义翻译观以及奎因的文化相对主义翻译观,等等。

更为重要的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均有其各自的哲学思想,对翻译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影响至深。事实证明,各种翻译研究思潮与思想亦有其哲学基础,认清哲学的发展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对我们厘清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脉络,客观评价不同时期、不同思潮、不同流派对翻译理论研究的贡献及其局限性大有裨益。

古典知识论哲学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这种哲学是一种本体论哲学。受古典知识哲学论的影响,古典译论只能源于经验或直觉,是个体的、艺术的,能提供的方法论甚少。认识论主体哲学打破了古典知识论的神秘主义色彩和不可知论,使翻译研究摆脱灵感与直觉。研究者开始关注客体,把语言分析和文本分析运用于翻译研究,寻找语言转换规律和语义对

① 刘宓庆:《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研究》,240 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5。

② 同上书,249 页。

等模式，形成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并产生了建立翻译科学的构想。哲学解释学是解构主义的哲学基础。解构主义思想是反理性的，视否定中心、拆解结构为己任，从而否认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翻译观，开始关注影响翻译活动的外部因素。解构式的翻译研究拓展了传统译学的研究疆域，翻译研究变成文化研究、意识形态等研究的附庸。

无论是以古典知识哲学、认识论主体哲学还是哲学解释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都无法更好地指导翻译这一人类跨文化交际的实践活动。“只有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从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观察翻译活动，才能扩大翻译研究视野，才有可能去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规律以及探讨合理的交往模式。”^①

有鉴于此，本章基于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渊源及其哲学基础，以历史分期为暗线，以翻译理论研究方法为明线，采用“史论结合”、“以家带论”，使翻译活动与研究相结合，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重点研究现当代时期的西方翻译理论。本章将西方翻译理论研究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20 世纪以前的西方译论、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视角、翻译研究的文化视角和翻译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本章通过系统深入调查，试图挖掘西方翻译理论各研究类型的根源，梳理其历史发展轨迹，彰显其特色。通过对西方各个学派代表人物及理论特点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把握各种类型学派的概念范畴及其核心观点，全面展现西方翻译理论的研究历史与总体发展。

二、20 世纪以前的西方译论

西方翻译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3 世纪。从广义上说，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 3 世纪至 2 世纪之间，72 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Septuagint^②)；严格地说，西方第一部译作是罗马最早的翻译家安德罗尼柯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为了揭示翻译理论思想的演进过程，这里将西方古典和近代文学翻译活动（20 世纪以前）划分为四个时期：古罗马时期的翻译、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14 至 16 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翻译（17 至 18 世纪）和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18 世纪末至

① 吕俊、侯向群：《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122~124 页，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② Septuagint，拉丁语，意指“七十”，表示既懂希腊语又懂希伯来语的 72 位译者共同合作翻译的结果。

19 世纪中叶)。^①

1. 古罗马时期的翻译

公元前 3 世纪左右, 罗马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半岛, 文化征服伴随军事征服, 征服的工具便是翻译。古罗马人通过翻译把希腊文化移植本土, 吸收希腊文学、历史和文化, 弥补其在人文科学领域的薄弱环节。将希腊语翻译成罗马人使用的语言——拉丁语, 成为当时的主旋律。大约公元前 3 世纪中叶, 罗马戏剧的鼻祖维乌斯·安德罗尼柯 (Levius Andronicus, 约公元前 284—公元前 204) 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Odyssey) 标志着罗马文学的滥觞。他翻译的《奥德赛》片断“是第一部拉丁诗, 也是第一篇译成拉丁语的文学作品”, “译文对引导当时罗马青年一代了解希腊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②

古罗马共和国末期政治家、著名演说家和拉丁语语言大师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 (Marcus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在《论最优秀的演说家》和《论善与恶之定义》两部著述中道出其最为精彩的传世之论: “埃思西尼 (Aeschines) 与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堪称两位最为雄辩的雅典人, 我曾将他们剑对对方所做的两次最为有名的演说译成拉丁文。我不是作为解释者, 而是作为演说者进行翻译的; 演说精神未变, 表达与修辞亦未变; 但使用符合我们表达习惯的语言, 所保存的是语言的整体风格和感染力。我认为没有必要像数钱币那样将原文词语逐个‘数’给读者, 而是将原文‘重量’‘称’给读者。”^③ 西塞罗的“解释者”式和“演说家”式翻译, 使他成为西方翻译史上有案可稽的正式提出两种翻译方法以及译作与原作关系问题的第一人, 从此正式开启西方译论史上关于“直译”与“意译”之间, 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绵延久远的历史之争。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和基督教的兴起, 西方翻译史开始进入宗教典籍的翻译时代。宗教典籍翻译的主体对象是基督教典籍《圣经》。公元 382 年至 405

① 此划分借鉴谢天振对西方古典时期和近代文学翻译的阶段划分, 将早期的文学翻译具体为“古罗马的文学翻译”。详见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 24 页,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另外, 谭载喜认为:“西方早期的翻译, 除《圣经·旧约》的希腊语翻译外, 主要包括古罗马时期的拉丁语翻译, 自公元前 3 世纪古罗马共和国中期起, 迄公元 5 世纪罗马帝国覆灭止。”详见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13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 19~21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1。

③ 申雨平:《西方翻译理论精选》, 157 页,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9。

年,哲罗姆(Jerome, 342—420)将《七十子希腊文本》与希伯来原文《圣经》比对,重新翻译,历时23年,最终译成《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①)。该译本在16世纪经“特兰托会议”(Council of Trent, 1546)被确定为天主教教会的官方版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哲罗姆坚决否认《圣经》翻译中存在着“上帝的感召力”^②,他指出:“对翻译而言,原作的思想内容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译者具有征服者的特权(Prerogative of a conqueror),将其移植到本国语言中。”^③哲罗姆的意译翻译法是西方翻译史上对“直译与活译”、“形式与内容”争议的发端,使西方古代译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所谓的作为译者“征服者的特权”可以说是现代“译者主体性”翻译观的始祖。

奥里利厄斯·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 354—430)的翻译观点则与三百年前斐洛的观点如出一辙,他坚持认为《圣经》翻译必须依靠上帝的感召。在所有译本中,他最推崇希腊文本,因而对哲罗姆的拉丁文译本颇有微词,多次致信哲罗姆,请求他采用一种“学者”的折中译法。这种折中译法虽未被哲罗姆采纳,却为后世《圣经》译者所沿用。

奥古斯丁在《论基督教教育》一书中直接或间接地涉及语言的普遍问题以及翻译问题。在奥古斯丁看来,翻译必须考虑“所指”、“能指”和“译者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意思和语言形式加以区分。意思是“常数”,是根本,语言则是一系列符号,在概念和听众之间架起桥梁。在奥古斯丁的理论中,语言符号等同于单词,翻译的基本单位是词,翻译对等是与原文词义间的对等。《论基督教教育》被视为古代语言学和翻译理论的重要文献。^④书中奥古斯丁对古代语言符号学说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符号学说的发展研究,及其所包含的现代数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基本观念,对伽利略、索绪尔等均有启迪。

“罗马人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的发明者。”^⑤从西塞罗到贺拉斯又到奥古斯丁,这些西方翻译理论的鼻祖和奠基人在始创了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开

① 源自拉丁文“Vulgata”,意即通俗、使公众知晓的含义,即钦定本。

② 哲罗姆的观点与斐洛·犹达欧司(Philo Judaeus, Philo of Alexandria, 25 BC—50 AD, 讲希腊语的犹太哲学家)的观点判若天渊。斐洛认为,为了忠实传递希伯来上帝的旨意,《圣经》翻译中坚持受上帝感召。

③ 刘宓庆:《翻译与语言哲学》,493页,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6。

④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⑤ Susan Bassnett. *Translation Studies*. Third edition.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50.

拓了西方译学理论发展的两条泾渭分明的路向，即文艺学派和语言学派。西塞罗、贺拉斯和哲罗姆顺畅的译风和敢于冲破直译陈规与原作语言束缚的勇气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坦途；奥古斯丁对古代符号学的研究与探索为英国哲学家洛克所借鉴，成为索绪尔语言符号理论雏形的思想源泉。

2. 文艺复兴时期的翻译（14 至 16 世纪）

文艺复兴的实质就是对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重新发现与振兴。复兴古典文化离不开翻译，“翻译成就了文艺复兴的名与实，而文艺复兴则为翻译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①。许多古典作品和宗教作品，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哲学等人文类作品被大量翻译成各个民族语言，对译入国文学语言的发展贡献卓越。在欧洲，这一时期的作家、思想家、同时又是通晓数门语言的翻译家纷纷发表对翻译的灼见。从 14 世纪到 16 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有意大利但丁的“文学不可译论”，德国路德的“翻译必须采用人民语言”，法国多莱的“翻译五原则”，英国查普曼“再造新形象”的诗歌翻译法。

但丁·阿利盖利（Dante Alighieri, 1265—1321）以一部《神曲》名垂文学青史，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初一位诗人”。但丁在《飧宴》和《论俗语》两部著作中阐述了其翻译思想：“……任何富于音乐、和谐的作品都不可能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破坏其优美与和谐感。正因为如此，荷马史诗遂未译成拉丁语。同理，《圣经·诗篇》的韵文之所以没有优美的音乐和谐感，就是因为这些韵文先从希伯来语译成希腊语，再用希腊语译成拉丁语，而在最初的翻译中其优美感便完全消失了。”^② 这就是但丁著名的“文学不可译论”，从此正式开始了西方译学理论史上关于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性的延续至今的漫长争论。

艾蒂安·多莱（Etienne Dolet, 1509—1546）是西方翻译理论史上第一个系统阐释翻译理论的人文主义者。他对经典的翻译解释，被认为是行走在正统与异教之间，并因此受到教会和巴黎大学封建势力的迫害。1546 年，法国索邦大学神学院认定，多莱在翻译柏拉图对话录《阿克西奥丘斯》（*Axiochus*）中一个有关“人死后的存在”的段落中，凭空增加了“一切皆是虚无”（Whereas you will no longer be anything at all）^③ 这一短语。多莱因此被烧死

① 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183 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② 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42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 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94 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在火刑柱上，年仅 37 岁，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第一位殉道者”。

多莱 1540 年发表的论述翻译原则的著名短文《论佳译方法》，奠定了法国在西方近代译学理论史上的地位，他本人被称为“法国译论之父”。多莱提出了关于翻译的五条基本原则^①：

- (1) 译者必须完全理解原作者的旨趣和原文内容；
- (2) 译者应该通晓原语和目的语两种语言，不损害原文的优美；
- (3) 译者不应该亦步亦趋，逐词对译；
- (4) 译者应该避免刻板的拉丁味太浓的语言，应该使用通俗语言形式；
- (5) 译者应该调整次序，重构语序，避免生硬的翻译。

多莱的翻译五原则是西方翻译史上划时代的创见，与 17 世纪德莱顿的翻译三分法原则和 18 世纪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一脉相承。

随着民族国家的崛起，教会的中心地位开始瓦解，作为中世纪通用语言的拉丁语日渐衰落。早期的宗教改革家借《圣经》民族语译本传播其宗教思想，翻译在宗教和政治斗争中成为反对当时罗马教廷的有力武器。17 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是对罗马教廷的改革，宗教改革的实质即是否可以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之争。

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于 1517 年公布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 95 条纲领），宣布其宗教改革纲领，激烈抨击当时教会的骄奢淫逸。95 条纲领在德国风行一时，各阶层教徒响应热烈，但纲领却触怒了当地大主教和教会，路德被开除教籍。路德的改革目标是整顿教律，返璞归真，因信称义，建立一个纯洁、廉洁和信仰自由的教会。由于坚持其宗教改革主张，路德曾数次遭到查理五世的逮捕，后藏匿于瓦特堡从事《圣经》翻译。《圣经》翻译即是路德宗教改革的实践之旅。路德从人文主义语言观出发，以通俗易懂为翻译原则和根本宗旨，他指出：“翻译中必须使用地道的德语，而不是拉丁化的德语。”^②“摆脱《圣经》只能用拉丁语直译的传统原则，让《旧约》中的先知们用自然的德语讲话。”^③路德以图林根地区的正式用语为基础，兼收中东和中南部地区方言的精华，使其德语译本《圣经》成为德语的典范，被誉为第一部大众的《圣经》，对德语民族语言的发

^① Douglas Robinson. *Western Translation Theory: From Herodotus to Nietzsch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6: 95-96.

^② Ibid., p. 87.

^③ E. A. Nida. *Approaches to Translating in the Western World*.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4: 9-15.